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日本经济的转折点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作者： 都留重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

译者的话

我们从各种渠道多次听到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最高曾达11·7%，这的确算得上是“高速度”了。但，这个“高速度”包括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它的形成原因应怎样分析？进一步发展趋势如何？以及今天面临着什么难题？这些，对于隔海相望的我们来说，总有“山在虚无缥缈间”之感。本书的作者都留重人，1912年出生在东京，在美国哈佛大学专门学习经济理论，曾任一桥大学校长，现任朝日新闻社社论顾问，目击了日本经济的长长短短，以“箇中人”身份讲出了“高速度”发展的苦辣酸甜。作者以“日本经济的转折点”为题，对它的增长速度生产目的，劳动组织，经济体制，从广义的社会效果上提出了另一种价值判断。作者认为“国民生产总值”只是反映了经济活动的一个侧面，而且是并不重要的侧面，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东西，并非都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国民生产总值”从另一种意义说反倒是“国民总费用”，而且，企业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滥肆开发，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失调，用技术排斥人的活动，等等。这一切，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反而不会得到任何反映。作者对濑户内海的严重污染深为痛惜，大声疾呼：不准企业随地便溺！要求日本经济从“以增长为中心”改变为“以生活为中心”，宁可增长为0，也要保卫国民福利，提出“为人类复权”“为自然复权”，焦急之情，跃然纸上。从作者的描述中，我们比较具体地接触了日本经济的不同的侧面。

当然，作者毕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方面已经意识到他所指摘的诸多弊端，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基础上不易解决。但又从“福利国家”的角度提出一系列方案，认为只要加强“政府干预”，设立“福利之柱”，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企业动机同“社会纯福利”的国民愿望，将会形成交叉点，象航船上的“帆”和“舵”一样结合起来，把经济之舟驶向彼岸。用这个眼界看待世界经济，幻想“南北差别”问题也可以按照这个线索解决。但，瞻念前途，步履维艰，以致他自己也把这些称作“新的想象”。

作者引用了其他作家的一些观点，因无法对照原文，都按本书的译文处理了。有关马克思的两段引文，同我国的译法小有差异，为保留作者的理解，这里也未作更动。

在处理译文时，虽然极力想要按中国读者的习惯使之口语化，但因能力所限，仍然有不少洋味，也许还有理解错误，谨向读者致欠！

政经教研室

古行健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五日

1、追求新的想象力

第一章 重新认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 1、比数目字更为重要的东西。
- 2、掌握关键需求的动态。
- 3、勿宁采用“国民总费用”的概念。
- 4、利润原理具有的制约作用。
- 5、“国民纯福利”的出现。
- 6、增长为0就是停滞吗？

第二章 向减速方向转变

- 1、增长率悲观论的根据。
- 2、不恰当的增长率予测。
- 3、在完全雇用方面的要求。
- 4、贮蓄是增长的源泉。
- 5、非生产性的资本追加。
- 6、“价格革命”的影响。
- 7、可供参考的西德的实例。
- 8、高度增长是“异常状态”吗？
- 9、刺激增长的特殊情况。
- 10、有利的汇兑率。
- 11、“山间休息室”式的保护政策。
- 12、增长要素已经达到极限。

第三章 福利的要求

- 1、向高度增长问“罪”。
- 2、劳动和业余时间的相互依赖性。
- 3、“工作”比“劳动”更重要。
- 4、对“老伴”的重新认识。
- 5、消费是对富的削减。
- 6、使福利成为真实内容的方法论。
- 7、四日市被工厂填盖了的实例。
- 8、为“福利列车敷设轨道。
- 9、把“打

算理论”降格。10、负担污柴费用的原则。11、自然保护由谁负担。12、为了转变想法。

第四章 转折点的双重课题

1、体制所具有的强制力。2、老前辈国家英国的实例。3、从福利观点方面进行计划。4、“计划化”占据的位置。5、“利润”的社会意义。6、技术进步是市场之敌。7、资本主义和雇用问题。8、对缩短劳动时间的研究。9、扩大公共资财部门。10、“人类值班”的时刻。

II、立于转折点的世界的 动向和日本的任务

- 一、限制主权的动向
- 二、世界一体化的背景
- 三、“国际性的贫困化”的实际状况
- 四、国际性的收入再分配的必要
- 五、“创造性的再调整”的设想
- 六、使收入转移能自行实现
- 七、改变产业结构
- 八、期待日本走向独立自主

1、追求新的想象力

“成年人很喜欢数目字，此外一切都无关紧要。与人初次相交，不问音容，不问爱好。只问：年华几何？兄弟几个？体重若干？以及令其拥有的资产多少？知道了这些，就俨然了解到其人的全部底奥！”

——引自桑、梯格久培里的“星之王”

第一章 重新认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1、比数目字更为重要的东西

所谓日本经济的转折点，可以说就是从“以增长为中心”改变为“以生活为中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提出：“用十年时间使收入倍增！”的口号时，就是为了使生活富裕。事实上从明治时代以来（1868—1912年）日本经济的增长概括说来使国民生活是富裕多了，这是无疑的。

那么，“以增长为中心”和“以生活为中心”有什么不同呢？非常明显，过去的十五年里是专心致志于高度增长的时代，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在世界上也受到称羨。平均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1955以后每年为9.2%，1965—1969年每年为11.6%，1970—1974年每年为5.7% 1974年减少了0.5%。……

但，同一期间，在国民生产总值上没有记载环境破坏和城市过密，这两者都积存了很多问题。而且，普通老百姓也深感“高度增长”同“生活质量提高”含义未必相同。

这种反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无论如何只要增长率高就好！这一点已有一般的理解了，在此没有详述的必要。另一方面是，与比率的高低无关，问题在于把经济讨论的焦点置于增长率的习惯。这种习惯在有识之士的思想上，或者在对群众的宣传上，都很难破除。如，报刊的大标题总是这样：今年的增长率是百分之几呀！行将到来的稳定的增长期间的增长率是8%还是3%呀！这种增长率意识实在成问题。

说得稍为极端一点，一国经济的总的增长率有类于国会议员出席国会日数的增长率。国会议员人数×一年间会期日数，就是最高的出席国会总日数。实际上，有的出差，有的病假，无论哪一年也达不到最高日数。然而，国会议员全体都希望在会期中能够出席，某一年这个出席率譬如说达到了80%，下一年就希望“增长”为90%，“增长率为负数”那就困难了。

然而，我们期待于国会议员的是他们出席国会时做了什么！譬如，在审议预算时怎样站在国民福利的立场上进行辩论的！在修改禁止垄断法上如何展现了政治才干，我们只关心这种内容问题。至于议员的出席率虽然重要，但，人们不会关心其出席率的增长。

经济的增长率也与此有相似之处。象桑、梯格久培里的“星之王子”中那个智慧的狐狸所说的那样：“不用心去看，就不能充分了解事物，至关紧要的东西也会看不中的！”本来，在经济学家心目中抓住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要限于它是我们福利的主要因素，在那限定的项目之中，内容怎样分配的问题。至于包括全体的百分比的延伸问题，那是和改善国会议员的出席率很相似的，在它们本身是重要的，可是我们更为重视国会议员诸君在国会的活动。

2. 掌握关键需求的动态

毕竟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有哪些主要因素组成呢？

通常，增长率是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的。有按各个时期的物价来反映的名义表现数字，有扣除物价变动的实际表现的数字。象最近的日本，物价腾贵已成常态的场合，没有实际的变化，只采取名义增长的形态。我们把增长率当作问题时，是要合乎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的，所以，只有名义的增长部分不过是象面纱一样的东西。如果说法不变，只有名义上的增加，国民各阶层的负担情形会有改变，原来的收入在通货膨胀中会受到不同影响。但在这里不必深究这种问题，还是想一想表现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吧！

国民生产总值有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这两者是同一个盾牌的两个方面，在数字上不能不一致起来。在需求方面大致分为：个人消费和民间总资本的形成（设备投资和库存投资），那是由政府购买的资财和服务以及出口超额部分来形成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需求方面的动态在决定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上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具有自发性的民间设备投资期望很高。在全体当中个人消费比例最大，这是适应于个人收入水平（不是按比例）来决定的。关于这种国民生产总值的需求方面作为短期的政策与各种复杂的因素纠缠在一起，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成为以后的研究对象。

那么，看一看供给方面吧！在这个方面，同定义问题相关联的主要因素很清楚，能得出与短期或长期问题无关的答案，即，若用

最简单的形式来分析国民生产总值的供给方面，那就是劳动总时数和和每一小时的生产性的相乘积。

加工制造业的劳动生产性与雇用状况：

	1966年	1970年	1974年
劳动生产性指数：	60	100	140
常用劳动者雇用指数：	85	100	99

如果这样说似乎没有什么，而在现实问题上这里的麻烦特别多。所谓劳动总时数，把一部分行业除外实在是不能正确计算的。在经营杂货店的小业主的场合，全家都在店里劳动，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开盘，延长劳动时数，是无法回答的。在大学教授的场合就更加困难，反之计算讲课时间是不行的，湯川博士不是拂晓在床上发现了新的原理吗？

在那里，我们计算的是继续劳动着的人数，那么，当然的劳动生产性，必须是每一个劳动力的平均数。当计算劳动力的人数时，由于人口会增加，伴随着技术“进步”，生产性会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供给能力当然是与日俱增的了。可是，一天内的劳动时间有可能减少，那是未必被注意的。

就生产性来说也有问题的，实际意义上的生产性因产业的扩展方法不同而有差别，有可能大规模进行的制造工业每年可提高生产20%，零碎的小商业就做不到，冗长的公共服务，过多少年也提高不了生产性。这样，在产业结构上生产率高的产业所占比重如果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就增长。反之，结果也会相反。

一句话，讲经济增长，那上面潜在着复杂的结构问题，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

3、勿宁采用“国民总费用”的概念

我们有必要更具体地想一想，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的经济增长率所受到的限制。

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有两种使用途径。一个是，把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所达到的程度作为指标。另一个是，把国民经济的丰厚程度用一个数字进行简要表示作为指标。一般人都认为这两者不是大致相同的吗？其实，在质量上可能有相当大的差别。在一百年以前，马克思写下过如下一番话：

“哲学家生产理论，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教科书，与此相同，罪犯就要生产犯罪。罪犯不仅是生产犯罪，与之相并俱来的是刑法和讲授刑法的教授。并且，这同一个教授为了把自己的讲义作为商品投入一般市场，也要生产教科书。伴随着国民财富的增加而来的，罪犯给予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是可以详细论证的。如果一个强盗也没有，锁钥会象今天这样发达吗？如果没有一个人伪造货币，制造银行券会有现在这种进步吗？由于犯罪不断更新攻击财产的手段，使得防御手段也要不断更新，在结果上也起了生产性的作用”。

从社会福利的立场来说，没有犯罪是再好不过了。为了实现这个再好不过的事情，就要增加那种社会生产物，但，应把它看做是一种社会的经费。在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商品和服务中，这种相应的经费支出多得出人意料之外。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民生产总值与其叫做国民总生产，不如解释做国民总费用更为恰当。

最近在美国，私人住宅要安装“防盗警报器”，设施费要花500美元，每年管理费要花300美元。但，强行侵入住宅事件在增加，因强行侵入住宅而抢夺财产事件，80%以犯人不明而告终。对此，人们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这种高级的警报器，能把警报铃自动地联通民营的警报受理公司，警铃一响，公司立即通知警察。除去这种装置以外别无他法。

把这种经费支出计算起来，恐怕最大的要数国防经费了。此外，公害对策费和工资劳动者的交通费，都在其内。在大萧条的时候，凯因斯对“公共事业”的有用性讲过这种话：雇用失业人员在不毛之地掘一个大洞，在其底部埋下纸币，上面堆放城市垃圾，全部堆满后再把洞掘开，以收回上述那一批纸币。确实，用这个办法能够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但，有别于给失业人员以职业，这种事业同国民福利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为摆脱萧条的一种经费开支而已。

提高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依靠于经费的开支，也要有把这些东西提供出来的余力。还要改变资源分配的应有状态，能够证实在那里有提供其他东西的潜在能力。也许可以作这样的论断，这是抽象地说应该如此。国民生产总值不论其内容如何，可以看出经济活动的全体规模。只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能满足私人资本追求利润的欲望的那种经济活动，是不会被人承认的，要是那种性质的东西，不管是什么都会得到采用。这一点在另一节里讨论吧！

4、利润原理具有的制约作用

说某种行为或事业“是经济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那种答案是很清楚的。那种行为或事业在市场的审判上回答说：赚得了充分的利润，就证明了它的“经济性”。如果招致了损失，就是落第了。这种市场的审判标准归根到底还只是一部分，现在是没有怀疑的余地了。为什么是一部分呢？一方面，市场的视野无论如何不得受短期的东西所制约。更为重要的方面，在其费用的概念中，要受到供应的限制，至于清洁的大气，自然的风貌，那种自由财富的损伤还未包括进来。

问题还不仅如此。认为市场审判是第三者，是客观性的，而实际上，巨大企业给予市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19世纪中叶，琼·拉斯金为批评私人企业在开展售卖攻势所进行的宣传活动时候^{哀叹说}“它使艺术退化，德行污浊，国家的生活方式混乱”。

现代社会在宣传手段上更加多样化，并极尽巧妙之能事，消费者行使独立判断是更加困难了。对此不再多说。

还有，在市场上不能赚得利润不得因而退出阵地的原则，并不只适用于因效率不佳而在同业竞争中的失败者。如，公共澡塘还有相当多的市民希望它继续存在下去，却因顾客数量减少而不能抵偿收支，不得已而倒闭者到处都有。同小汽车混杂在一起在主要道路上行驶的公共汽车，由于同样原因也被废除了，虽然在许多场合还有希望它存留下来的人，不管这种要求多么强烈，但不能反映市

场的要求。市场是贯彻冷酷斩杀的理论的。

在市场审判面前要赚得充分利润这种“经济性”的标准，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那种显著的选择性，如果借用加尔布雷思的话说：把重点置于市场的“经济性”的社会发展，归结起来的结果是：“民间财产的丰厚和公共财产的贫困两者并存”。美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一位，而这种并存的矛盾也非常明显，这种事实决非偶然。在企业利润这个晴雨表上没有反映出来的福利要素是很多的，不妨说已是现在社会的一种常识。

虽然高喊着“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产业界的原理态度依然不变。1975年底，为回答法务省关于以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中心而根本改订公司法的照会，经济团体联合会向法务大臣提出了综合意见书，其基本的思想方法是强调“企业成功与否是用利润来衡量的”有关社会责任的一般抽象规定，是企业目的之外的强制行为，采取了明确的反对立场。

这决非意外之事，只要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当然又当然的了。用这种公认的“经济性”的尺度，还原为一个单纯的量的大小，来总计其高低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在其上也不在其下，理解了这个问题，对于它的增长率的性质也务必不要误解。

理解了这种性质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不弄错其增长意义的限度内，把它作为客观的分析工具，那种国民生产总值还是有用的，但不要那种“僵死的国民生产总值”。

5. “国民纯福利”的出现

前面已经写过，国民生产总值这种概念有两种使用途径。一个是，由市场经济能够公认其“经济性”的生产活动，表现其总计的大小作为指标，如果不返背这种意义的内容，其使用途径是很宽广的。

另一个使用途径是把国民生产总值看做是简要表现国民经济的丰厚程度的一个数字。在这种场合，国民生产总值用人口数除，得出的每人平均数，把它进行国际比较，以论断各国的生活水平的高低，这种方法不断地被使用着。譬如，现在的美围接近6,000美元，日本超过3,000美元，象印度那种发展中国家还沉沦在100美元左右。还有，几年前就有几个经济学家认为，到1985年，日本的数字要超过美围居世界第一，用这种明确的预见给国民带来期待感。

用每人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比较，若有美围同印度那种程度的距离，两国国民的生活水平的高低云云之事是可能的。如果数字接近，还不就是那回事。在国民生产总值这概念上，有如前所述的制约和偏颇，由于各国情况不同，不能进行简单地比较。那么说，在同一个国家，能否把平均每人的国民生产总值看做是福利水平的提高呢？那也是有疑问的。若采取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国民总费用”的思想方法，当然不能说费用增加了，福利就提高了！

经济学家一方面动手晚了一点，一方面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站在福利的观点上，必须制定同国民生产总值不同的新概念，在那里出现了“国民纯福利”这样的概念。

在实行国民纯福利的场合，首先争论的对象是对伴随生产性提高而来的业余时间如何评价。前面谈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供给能力时，一天的从业时间有可能减少时，结果就产生了业余时间，在国民生产总值上成为负数的因素，而站在福利的立场上就成为正数的因素。所以，在同生产性的提高成反比例的劳动时间减少的场合，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时虽然是0，在计算国民纯福利时，仅只是增加了业余时间。那就是正数的增长。

此外，主妇在家庭内提供的服务，无论是烧饭、育儿、洗衣的任何一项，都应看做是国民纯福利的一部分，但未加入国民生产总值之中。所以，家务劳动和襁褓服务之类商品化了，国民生产总值因而增加了，而国民纯福利并无变化。还有，在生产过程上产生了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之类的公害，市民为此蒙受损害，只因这一条就削减了国民纯福利，而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却未当作负数来计算。所以，在高度增长之下公害如果按相同的比例增大，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增长完全被抵销了，国民纯福利的增长为0是完全可能的。

必要的修正项目此外也有一些，由于学术界尚无肯定概念，计算方法有很多分歧，在日本或美国关于国民纯福利都采取试算办法。如，在美国的场合，每人平均的国民纯福利，在战后阶段差不多是增加一倍，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两倍。在日本，经济审议会的国民纯福利开发委员会试算时，很明显，国民纯福利并未增长到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那种程度。

福利的诸因素归根到底不能一切都是数量化的。所以，国民纯福利是极不完全的，可是作为福利指标国民生产总值是更为增加了，尤其是为了不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错认为是福利的增长，提出另

外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6. 增长为0就是停滞吗

前面，把经济增长率看成同国会议员提高出席率是一样的东西，那确实是极端的说法。

恐怕比什么都有力的反驳是这一条，在议员出席率为100%的大厅里，那里的各位议员都非常精勤，再也得不到进一步增长了，而在经济方面，虽然有进有退，同人口的增加和生产性提高联系起来，能够继续增长不是很正常的吗？第一，若是没有希望提高生活水平，那个社会的前途是暗淡的。

就是说，“增长为0”，一般认为那是比什么都更为悲观的事情了。然而，前面已经说到，虽然同是“增长为0”，有的是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有的是关于国民纯福利的，那是需要明确区别开来的。假如在生产性的进展上没有限制，如采取同生产性提高相适合的减少劳动时间、增加业余时间的方法，在国民生产总值上一方面增长为0，一方面国民纯福利能够得到确实扩展。

琼·斯察特·密勒也注意了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强调增长为0不就是停滞，他写道：“资本和人口的永恒不变状态（增长为0）并不意味着人类进步的永恒不变状态，在那里和从来同样有各种智慧的教养、道德以及社会进步的余地，也有改良生活技术的余地，那种改良的希望是更为强烈的”。

在这里，正如密勒所说的，物质手段虽然相同，有意识的有效使用方法不同，福利的内容可能很不相同。事实上，凯因斯在半个

世纪以前就以“我们子孙们的经济的可能性”为题进行讲演时说：让一切人都富裕起来的日子也许不那么遥远吧！那个时代到来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说，让目的重于手段，让有用性好于良好性吧！”

经济增长在任何地方都是手段。同“手段”相比，更注重“目的”的社会，包括在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之内的，如物质财富的充足，花鸟风月的爱好，工艺美术的欣赏，耽于晴耕雨读的朋友的交往，把这些都当作重要方面，那才是稳定的社会。必定有人说：那是乌托邦！然而，我们的社会恐怕不会从注意“手段”突变为注意“目的”，我以为要慢慢地向那个方向发展吧！并且，以更大的程度注重“目的”，在“手段”的尺度问题上减弱增长率意识，从“以增长为中心”转变为“以生活为中心”，将能走向这个方向吧！

然而，所谓日本经济现在已有转变，同这个方面相适应，还有另一个问题要引起注意，那就是从曾经是9%或10%的高度增长时代，到5%或6%的所谓稳定增长时代减速的过程，对于政府、企业、家庭生计，要迫使它们改变高度增长期间的习惯性。把转变作这种解释的观点，那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把“要赚钱”作为基本性质的东西的。

辛比特讲过一句著名的话：“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有可能是静止的，资本主义社会如不能不断前进，自己就不能存在下去。”

特定的经济体制所具有的特征是不能无视这个问题的。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以利润为引导并且成为利润的根源的增长率要减速，那就提出了很大的问题来了。把这种意义上的“经济的转变”在下面作一番研究吧！